

# NATIONAL INTEREST

高全喜 主编

刘苏里、于向东之系列对话：“世界秩序中的中国”

专题论文：

徐弃郁：“大海军建设”与威廉德国的海洋转型

霍伟岸：分配正义的古今之辨和古今之变

朱 剑：经验、二元和现实主义——卡尔国际关系思想的架构和评判

刘 晋：权势与威胁——乔治·凯南对苏联的认识与冷战初期美国对苏政策的缔造

9

2012年第3卷  
总第9卷

# 大观

世界观察研究院 主办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 NATIONAL INTEREST

9

# 大观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 主办

主 编：高全喜  
编 委：谈火生 施 展 王 利  
        泮伟江 李 筠 咎 涛  
        吴征宇 周林刚 邱立波  
        李永晶 翟志勇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观. 第9卷 / 高全喜主编.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118 - 4212 - 1

I. ①大… II. ①高… III. ①国际政治—文集 IV.  
①D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3256 号

大观(第9卷)

高全喜主编

责任编辑 董飞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版本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张 16.25 字数 197 千

印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陶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4212 - 1

定价:3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 写在前面

周边世界看中国,中国看周边世界,自古如此。

古典时期,中国看周边世界,五服之分,华夷之辨,立足于自我叙述的常识之上;周边看中国,倒是更实用主义,因需调整视角。这差别,原因无二,盖中国不真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中国文化是强势文化。

近代以来,东西碰撞,强势的中国文化遭遇更强势的西方文明,前者仍沿袭看周边世界的姿态,一败再败,不明就里,自此陷入混乱,自知与他知失去方向感。

中国人从无认识他人的训练,历史长河中,他人永远是被定义的对象,而非自我认知的坐标,所以,中国人也并不真的知道自己是谁。中国是天下的中心,中国人是天下的主宰。天下的根本逻辑,是神州文化四处布化,是各化外之地的归化。这里没有历史,历史早在布化与归化陈陈相因的循环中终结。

中国人也做过认识周边世界的尝试,比如魏源,比如梁启超,比如顾维钧。所有努力,或不被重视,化作国朝上下共识,或被一次次激烈革命打断,半途而废。中国人始终建立不起对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最终也不能完成自我定位,因此付出的代价,庶几无可计算矣。

然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又岂能离开世界。认识他者,同构于自我认知过程,建立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也是完成自我定义无可取代的前提。只有在此项工作完成基础上,中国人才能重新构建基于我们自己视角的全球格局体系,从而探索我们的利益所在,为世界规模的和平治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本书试图为此做出努力。

这努力也是一班有志者的自我教育过程。当代一部分知识人长期昧于小圈子利益,坐井观天,画地为牢,长于“主义”之争,短于建设性批判,局限了他们的视野,混乱了他们的立场。而一个民族的命脉,很大程度系于知识人的全部积累、创造性工作。建立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进而构建全球格局体系,都缺少不了知识人的精密且具宏观视野的基础工作。此一过程艰难而艰深,在开启学习先进国家理念和方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开展自我教育,使我们全部身心投入到这一工作中来,在其间获得灵感,取得进步。

《大观》编者

# 目 录

## 一、“世界秩序中的中国”:刘苏里对话于向东

产业梯度转移的终结:中国工业化的前景

——“世界秩序中的中国”之三·刘苏里对话于向东

刘苏里 于向东 003

绝对不均衡:中国经济成长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世界秩序中的中国”之四·刘苏里对话于向东

刘苏里 于向东 017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冲突

——“世界秩序中的中国”之五(上篇)·刘苏里对话于向东

刘苏里 于向东 043

世界主义:中国民族意识的转向

——“世界秩序中的中国”之五(下篇)·刘苏里对话于向东

刘苏里 于向东 057

## 二、专题论文

“大海军建设”与威廉德国的海洋转型

徐弃郁 077

分配正义的古今之辨和古今之变

霍伟岸 095

经验、二元和现实主义

——卡尔国际关系思想的架构和评判 朱 剑 109

权势与威胁

——乔治·凯南对苏联的认识与冷战初期美国对苏政策的缔造  
刘 晋 138

三、宏文与解读

关于英国与法德两国关系现状的备忘录 [英] 艾尔·克劳 165

舰队·均势·安全:《克劳备忘录》与世纪之交英国的安全观 刘 怡 206

四、翰墨短简

“中国的”政治哲学 姚中秋 237

“政治方案”与“政治问题”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问题意识 尹 钛 242

稿约 251





the Making of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Early Cold War	Liu Jin	138
---	---------	-----

### **Classical Papers and Analysis**

Memorandum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British Relations with France and Germany	Eyre Crowe	165
“Crowe Memorandum” and the Leading Maritime Power’s Conception of Security	Liu Yi	206

### **Reading Notes**

Political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o Zhongqiu	237
“Political Programs” and “Political Issues”: The Issue 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Ying Tai	242

一、“世界秩序中的中国”：  
刘苏里对话于向东



## 产业梯度转移的终结：中国工业化的前景

——“世界秩序中的中国”之三·刘苏里对话于向东

时间：2011年4~5月

地点：北京—上海

作者：刘苏里 于向东

此篇对话进入问题的深水区，可以看作系列对话之二的姊妹篇——上篇谈中国经济成长的秘密，该篇是对“秘密”的进一步揭示。虽然标题冠以“前景”，但说到底，“秘密”谈不透，“前景”无从谈起，谈也是瞎谈——这样的情形太多了。

在对话中，于向东对基于经济实践一线经验的“基层自主性”概念做了细致发挥，指出了它的消极面，同时又分析了这一与全球化关系密切的本土力量在中国未来社会—政治变革中可能呈现的状态。无疑，对话者们对这一力量有所期待。

对话还首次提出了因中国制造业规模的性质,全球产业转移将终结于中国工业化完成之时的大胆假设。当然,读者们也不能错过于向东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认知误区,对我们思考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重大影响的论述,尽管他的重大发现还有待优化。

不得不说的是,一方面因所谈话题虽具有大众性却往往似是而非、真假莫辨,一方面又因对话时间不够充裕,且学术化倾向较重,因而使谈话对没有相关背景知识的读者来说略显艰涩,在此向读者表示由衷歉意。

所有对“秘密”的揭示,都是无止境的智力活动,我们只是企图靠真相更近一点而已。

**刘苏里(以下简称“刘”):**系列谈话的基础部分,今天该做个了结了,这样下次可进入国际层面。

**于向东(以下简称“于”):**上次谈到中国经济的“基层自主性”,有时细想,让人有不寒而栗的感觉。在基层,这种大量企业自生自灭的现象,近似“返祖”,很多时候表现出“前现代社会”的特征,我们常用“黑社会”来形容它。实际上,以“官商结合”为特征的这一企业现象,不仅瓦解了“现代社会”(不管这个社会依照何种现代性原则建立)的根基,损害了原有的基层社会传统,还毁坏了经由革命所确定的道德准则,而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社会沉沦”。

**刘:**这个所谓“基层”,虽然常常在县(包括县级市)这个“权力域”层面上活动,但实际上高可到“市”和“省”,已并不“基层”。这样一来,它对“现代社会”的瓦解作用就带有政治性,这种政治性要在一个较长时段里才可以被我们认识并加以描述。

**于:**问题于是来了,这一“基层自主性”瓦解作用的背后,有多大的建设性呢?在改进社会的努力中,这种“基层自主性”是否可以凭借,进而成为新社会建设的推动力量?

**刘:**我想首先表明的是,你所说的前现代社会现象,并非前现代社会

独有。这里我们暂且先不就它的内涵做严格限定,回到讨论的问题上来。首先,这个力量可以持续吗?持续条件是什么?其次,在什么条件下,它才可能成为建设性力量?上次谈完话,我就在想,没有适宜的政治环境,这些“基层自主性”不可能成为健康的力量。

于:这个力量当然可以持续。从开放前 20 多年这个阶段来讲,“基层自主性”曾以一系列的政治条件为前提,例如“对外开放”和“致富合法性”,这是邓小平的“硬道理”,也是执政党的所谓政治底线。过去几十年确实有过几次“历史关头”,几乎要失去这些前提,出现“倒退”。但时至今日,“基层自主性”已经成为自主的历史力量,并以自身发展维护了它存在的条件。换句话说,已无任何力量可以通过更改“开放”和“致富合法性”这两个历史前提而来终结“基层自主性”这股历史力量了。常常有人形容市场经济力量不可逆转,但此说并不准确。因为说到底,只有这个与基层政权体系相结合的市场力量才可能成为不可逆转的力量。这里没什么特别的秘密,其实就是觉醒了的可以自我定义的(地方利益的确定者)力量与其反对力量的“对比”而已。这个力量之大,没有其他力量反制得了。所以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相对简单,复杂的是后面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过“基层自主性”力量对政府干预的对冲作用这个话题。事实上,这个作用,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理解。以前者而言,它可以矫正、抵消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的“有害影响”。上次我们就谈到,正是这种积极的对冲作用是中国成长的“秘密”。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基层自主性”有其保守的一面,即它可能会被动地成为政府干预的“函数”,因为它无法主动设定议程来确定自己的“自主性”存在。换句话讲,它是一种消极的“自主性”,是一种尚未取得自身政治意识和表达形式的历史力量。

刘:我很赞同你后面的表述。或许正是这种“消极性”使这个力量的“建设性”难以发挥出来,甚至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因为一个社会再

糟,也难以长期容忍“黑社会”的存在。但有一点必须指出,我们所说的“黑社会”现象,绝非通过“打黑”就能解决。

于:没错。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难题之一:“基层自主性”的政治性构建如何进行。如果我们仅在稳健的社会政治演进的假设下考察这个“函数”关系,那么大多数情形下,“基层自主性”在对冲政府政策时,会在确保自我存在的同时带来很多的“社会丑恶”。而这些“社会丑恶”当然也会持续地恶化着政府的政治基础。

刘:对。如果认不清“恶化”的根源,那么所有措施,要么舍本逐末,要么缘木求鱼,最后整个社会将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最近几年,我们曾多次观察并评论了诸多愚不可及的“干预”政策带来的“丑恶”反应。遗憾的是,“愚不可及”却在每时每刻发生。

于:我们这个执政体系已经彻底“理性化”、“工具化”了,它已经变成“去政治化”的官僚体系了,难以改变。它实际上就是被前人仔细分析过的那种官僚制(刘:韦伯分析过吧。)。在官僚制下,所有引入的变量都只能是“行政的”而不是“政治的”,因而引发的对冲作业也就必然会带来“社会丑恶”。而在极为罕见的情形下,执政体系之外某些力量抵制了“行政化”,进而形成政治决断,那么,在同样的函数关系中,引发的对冲作业就会引起“基层自主性”的自我重构,只有在这少见的情形下,才能认真考虑“基层自主性”的建设性作用。说白了,就是要有政治人物做出政治决断,才能使“基层自主性”成为一种建设性力量。现在流传的各种政治改革的说法,实际上只是在“官僚制”下的“行政游戏”而已,当不得真。只有那种克服了“行政化”约束的政治决断,才能超越官僚制,才能推动政治改革。

刘:我并不太同意你官僚体制“去政治化”的说法。它应该还有政治的面向,只不过是虚饰的,因而更有害。行政化的本质之一,是行政权力的配置。而所谓的政治决断,是要超越权力配置,基于历史和社会大方向

做出判断进而采取行动的。很多时政观察家,不知不觉在意识上成为“权力”的俘虏,把权力游戏当作政治改革本身。但事实上,不论这些游戏有多少,有多么不同,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只不过是一群庸官们权力欲望的投射以及无权者们对自己与权力相随性的想象罢了,天可怜见!

于:其实,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道理也是如此。只不过我们在“基层自主性”这个“函数”关系中可以具体分析官僚制下“行政的”决策与“政治的”决策的区别。

刘:然而,做出政治决断,是可遇不可求……

于:我们只能讲,在某些大趋势之下,这个“可遇”的概率比较大。而我认为,我们已处于这样的大趋势之中。它包括了两方面:一是中国下一个30年的工业化进程;二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建构。这两个方面都同我们上次讲到的基于分布式计算技术与中国巨量人口结合而形成的独特的产业整体进化方式有关。具体来说,就是这种产业整体进化方式,形成了一个恒定的“成本洼地”,也就是说,制造业成本既取决于传统因素,例如企业内部成本,外部产业配套成本,也取决全新的非传统因素——在整体进化过程中,通过大幅度改善传统成本项目的作用效率而实现成本优势。

刘:哎,你的表述太学术化了,干脆举个例子,听起来容易。

于:有个现成的例子,即美国资本市场对科技产业的作用。美国通过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的改造相结合,全面提升了科技转化为产业的效率。具体来说,在科技型企业发展中,所有传统的成本项目既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加,一个传统的会计师可以无障碍地承担起一个科技公司的全部财务管理。但事情显然已经不同了,因为外部资本及投资环境的变化(如风险资本的早期投入,纳斯达克市场的投资退出机制等)改变了所有传统的成本项目的实际作用过程,并大大提高了它的效率,从而形成产业优势。这是一个相当清晰的例子,说明某种产业所依存的那个经济整体的某种



特质,可以使该产业拥有特别的竞争优势。而这个例子就与中国产业整体进化的那种特质很相似。此外,我曾推荐过一本书——《一件T恤的全球经济之旅》,书中谈到美国得克萨斯州棉花种植业优势长期不衰,同得克萨斯州独有的农业农业科技环境有关也是这个道理。

刘:整体环境(当然这个“整体”常常是以民族国家为界)的改变,可以降低企业或产业的成本水平,或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于:这种关系应当有普遍性。但在相互竞争的状态中,不同国家和地区,这种关系呈现的水平是不同的(这可能还同他们的文化特质有关)。例如日本、欧洲,只在某些类别(如时尚和精密产品)的生产上,有类似的整体效应。而中国和美国,则体现为大规模市场的效应。中国侧重于制造业,美国则在创新技术上更有优势,二者相似的地方是其规模,日本和欧洲都不具备。印度也许会提供另一种独特的例子,但至少在近一二十年,印度还不会完成这个例子。

刘:你强调规模的特殊作用,这似乎是你常用的一个分析工具。

于:规模,首先包含了某个方面内部的一致性,不是说你有几亿人口就一定有规模。非洲有10亿人口,分布在50多个国家,10亿人口这个规模就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前面谈到了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性(且不论这种完整性是如何建立起来、如何确保的),它使中国在内部建立了全面的一致性,只有此时谈规模才有意义。而在军阀割据时代,内部缺少一致性,你谈中国市场规模有多大就没什么意义,你最多说上海及周边市场有多大。其次,必须要有能在这个规模水平上进行动员的相应技术手段。没有这个技术手段,你就无法动员起这个规模,那么对你来说它就是个负担。这个技术手段就是分布式智能技术。在这些条件下,规模就不仅只是个数量指标,而是成为了测定事物不同性质的指标。不同的规模使事物的性质发生改变。中国和美国处在规模的最高水平上,有着迥异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特征。在中国,这个规模效应,就是制造业的“成本